

身边的冬野

彭程



冬至之日，我又来到了这一处郊外公园。

一年四季，我多次来到这里，目睹过它不同时节的面貌和神情。冬至节气的到来，意味着冬天进入了一种纯粹深沉的状态，最能够袒露出这个季节的本质和底色。

没有一点风，前后左右，到处都是静寂凝滞的模样。抬头看去，天空呈现一种均匀的淡蓝色，没有一片一縷云彩，仿佛有几分不真实。一排高大的白杨树，稀疏光秃的枝干叠印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中，线条疏朗遒劲，有油画般的效果。

目光从高处和远方渐次滑落，缓缓地移到眼前。脚下是一条柏油路，路边的草地上，连同每一棵树的树坑里，都盖上了厚厚一层黄褐色的落叶，干枯卷曲，仔细看还裹着不少细小的树枝。路的另一侧，是几畦收割后的稻田，一簇簇大约两寸高的根茬，紧紧贴附在浅白色的干涸的地表上，像是凝结了一层薄霜。

前方不远处是一个小湖，曾经的潋滟波光已被封存于冻冰之下，冰面坚硬粗粝的质地，望过去就能感受到一阵寒意。几个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溜冰车，动作姿态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。湖边一圈茂盛的芦苇变得枯干，白茫茫一片，苇杆顶端一簇簇单薄的芦花，在几乎静止的空气中微微摇曳。

一种深沉寥廓的宁静笼罩着原野。公园远离城市，乡野特色十分明显，加上游人稀疏，就更是如此。但主要的原因还与时令有关。在其他几个季节里，大自然呈现出的却是无比的热闹和喧哗。那么多的乔木和灌木、花卉与杂草，用树冠的搭连、用枝条的交错，用藤蔓的牵绊，用根须的虬结，彼此肩搭背地交织在一起，茂盛葱郁。它们遮蔽了天空，阻挡了平视的目光，更将地面遮盖得严严实实。

在春天和夏天的漫长时日中，我曾经颇费心血，才弄清楚了很多树木花卉的名称，但如今却又有不少重新变得陌生。我知道，是冬天不动声色地破坏了我的努力。我与它们的联系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通过不同形状色彩的枝叶和花朵建立起来的。伴随

它们一同出现的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氛围，来烘托和强化各自不同的情调。但这些凸显不同植物科属的特征的东西，在这个季节中却被极大地剥夺和削弱了，让我试图叫出名字时变得迟疑。我感到一些轻微的沮丧。花朵凋谢，树叶脱落，只剩下树枝简洁刚劲的线条，每一株花，都成为独立的个体。那种软软孑立之感，即便是从最为邻近的两棵树下，也能够感受得到。这种情形，让我联想到一个人的孤独和迟暮。

如今想来，数月前的从绿叶纷纷被杂花乱眼中走过，以及油然而生的亲昵愉悦的感觉，都好像不真实，仿佛一场梦幻。庄子的梦里，不清楚是自己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。置身冬日的原野中，在某个恍惚的瞬间，我也产生过这样的意念：哪一个才是错觉，是眼下视野里的肃杀萧瑟，还是不久之前的蓬勃葳蕤？

这样的静寂和旷远，容易让思绪从眼前逃逸出去。我的意识曾短暂地跌入遥远的过去，脑海中模糊地闪现出华北农村的乡野田园，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。它们影子一样飘忽，连接了某件模糊的往事，某种朦胧的情绪，但都不能成形，仿佛一只掠过天空的飞鸟，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就消失了。

一片萧条中，万物都在收敛和缩减，返回自身的质朴素简。唯一相反的是树上的鸟巢，它们获得了放大和凸显。我好像第一次意识到，高高低低的树杈间，

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鸟巢。其他几个季节里，它们被繁茂的枝叶遮蔽了，大多数看不到。它们的居民的身影，在当下也显得更为活跃。时常会有一只或几只鸟儿从头上掠过，像是一道闪电。但我很少听到鸟叫声，或许是被寒冷哑了歌喉。它们落在地上，在枯干的白草丛中走动觅食，身上的羽毛黑白相间，既庄重又滑稽。更经常见到的是成群的麻雀，从某个方向飞来，倏地落在一棵高处枝条上，像是骤然降下的一阵雨点。

一只流浪狗追着人跑了一段路，有时跑到身旁，随后又后退几步，目光中有一些讨好和乞求，还有几分胆怯和畏惧。它试图接近我的目的，不过是为了寻觅一口吃的，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带。这样的严寒季节，对它是至为艰难的时日。

四野寂寥。我想到了一个说法：“冬藏”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写道：“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。”这个属于节气物候的古典词汇，指代的是大自然的规律，本身也具有文学的意味，一种修辞的魅力。走在裸露着的田野里，满目的简洁清爽，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词的涵义。这个时节，植物都将生命收缩在根茎里、枝干中、树皮下，仿佛坠入了一个漫长深沉的梦境。你很容易想象，当一场大雪降临时，便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。

但沉静并不是死寂，虽然看上去似乎萎靡呆滞，但这只是假象。每一棵树都抱紧了生命。缺

少光泽的粗糙的树皮下面，有汁液在蓄积和流淌，等待着合适的时刻，再将自己打开。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将看到新一轮的繁盛，春天的生发，夏日的张扬，会重新降临在大地上。就仿佛在生活中有时会看到的情形：一个人消失了，几乎被人遗忘了，但有一天重新出现，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周身闪耀着别样的光彩。

一路走着走着，到处都能接受到这样的预示着蜕变的消息。

供游人散步骑行的绿道两旁，杂乱的枯叶盖满了枯黄的草地，中间掺杂着坠落下的数种树木的不同形状的果实，被融化后的残雪和泥土弄得脏污。它们都将化为肥料，滋养下一季的春华秋实。几株忍冬萧瑟光秃的枝条上，还挂着一串串豆粒大小的浆果，为小鸟提供点心，虽然色彩已不复秋天时那般晶莹红艳。那一丛有着小丘般阵势的藤萝，我认出来是连翘，春天时压弯了树冠的繁茂花朵，曾照亮过周边不小的区域，如今虽然枝叶皆无，但那种蓬勃霸气的风度和姿态犹存，没有被寒冷剿灭。它们等待着地下的看不见的阳气生发、汇聚和壮大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生命从枝条花芽中喷涌出来，猛然间再一次将天地改陌。

循序渐进，物极必反，周而复始……这些成语由于耳熟能详而显得平淡无奇，但并不因此而失却它的力度。大自然以循环轮回的方式，完成着自身的递嬗造化。一条看不见的巨大链环，在天空与大地之间，不动声色地架设起来，伸展开来。我看到的一切，都是这个链条上的细节，即便是最为细琐琐屑的部分，透露出的也是某种整体性的信息。

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兼自然学者包罗斯的一段话：“自然之书就像是以各种语言、不同字体所写成的篇章：横七竖八，掺杂着各式注脚。有粗大的字体，也有细致的笔迹，有隐晦的图标，也有象形文字。读得最慢，甚至干脆停顿下来的人，读得最好。”眼前的风景里，那一份单调中的丰盈，枯索中的活力，无疑也属于自然之书中的一页。

我停下脚步，望着身边的这一片冬日原野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。



让文学为生活伴奏

张健全

我常常在想，天下无一人生活在真空中，谁的生活中都有太多的鸡毛蒜皮。倘若把文学比作乐器，让它为生活伴奏，有时交响乐，有时钢琴调，有时小夜曲，则生活的滋味可能会更美妙，也会更令人神往。

从小到大，仿佛文学都在我的身边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学工劳动。我们去造纸厂劳动，就是清理废旧书报。可是堆积如山的废旧书报中，还有许多完好的书籍，我们舍不得扔，同学们就纷纷藏着自己想看的书。我参加过几次学工劳动，竟然拿回家二三十本书。我父亲做的书架上，就有了《李白与杜甫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中国文学史》《苦菜花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，还有五六十年代的《诗刊》等等。

有了书，我不再听别人讲故事了，我自己看，我看完了自己藏的书，又与有书的同学交换。我的发小家里有个书房，有满柜子的书，我就是在他家借到了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。

书看多了，我就真切地知道书为不同的人所写，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书，有人写厚书，有人写薄书，有人写长文，有人著短章。

我从此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我放学回家放羊时，就把自己编进了“王二小”的故事中，我给自己取名“战娃”，战娃的故事我对我家走亲戚的表弟讲了一遍，没想到他后来老是缠着我给他讲战娃的故事。

表弟这个听众无意中鼓励了我，我发现了自己的“能耐”。等我上了高中，专业分班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“文艺理论班”，而且成为班里写作组成员之一。高中一年级时，同学们就叫我“笔杆子”，我受此鼓舞，写了短篇小说《验粮》，投寄给《陕西文学》。在退稿信上，编辑称我“建全同志”，这让16岁的我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才子。

1978年春，我刚满18岁就参军入伍，在新兵连集训期间，我除了写日记，代个别战友写家信，还写散文。有一篇题为《湖南的山乡》的习作，被政治处干事看到了，他评价说：“语言朴实，观察细腻，写得好！”他鼓励我坚持下去。

我就此成为团宣传股重点培养的“写作苗子”，下连队当了一年文书后，就调入宣传股，当了新闻报道员。引领我踏上新闻这条路，则是文学这盏灯。

19岁那年，我的散文处女作《春节》发表在当时我们部队三营所在地洪江市文艺月刊《山泉》上；一年后，我调到北京，开始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文章。不久后，我被评为优秀报道员。

写作固然有分类，各有各的名堂，但一样的功夫是思想的能力与遣词造句的技巧。

我从部队转业后，业余爱好仍然离不开文学，作家梦长久地萦绕于我心中。我先后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、海南省作家协会。

我是以商人的身份退休的。一退休，闲暇就多了，这时受情感牵引，就又寻找文学这位“初恋情人”。而面对文学，我有时愧疚，有时坦然。愧疚的是，作为精神世界的“情人”，我为它付出的太少了；坦然的是，我没有“移情别恋”，没有从情感上远离文学。我没有写多少东西，但却看了不少东西。我想说，热爱足球不一定下场踢球，当球迷岂不是大多数足球爱好者的状态？文学亦应同理。写书与看书其实是文学生活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。

如果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让我对村外的世界一头雾水，那么当我有书可读时，上下五千年

的历史，纵横几万里的宇宙，也就在我心里完成了立体的拼图。同时也因为这些书，帮助我构建起一个成人的精神世界。《水浒传》让我理解了江湖义气，《红楼梦》让我懂得儿女情长，《简爱》让我看到爱情世界里的平等，巴尔扎克让我感叹资本主义的原罪，高尔基打开了我认识红色苏维埃革命的窗口，海明威则用一个老人的捕鱼故事，诠释了英雄主义。而我的三位老乡，路遥写他的陕北，陈忠实写他的关中，贾平凹写他的陕南……

自认为热爱文学的我，也会偶尔手心发痒，忍不住要写一两篇小文章，谈往事，抒真情。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，文学给我的好处，绝不仅仅是发表过零星的作品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选择了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，令我的精神愉悦且充实，自觉生命的质量也在一点点得到提升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我是一个让文学为自己的生活伴奏的人？即便是经商的那些年，文学也没有与我分离，它好像以另外一种形式与我相守相望。当我现在又想提笔写点东西时，包括商海经历在内的一切生活体验，皆成为创作的矿山。

几次和牛犇老师联系，不是联系不上就是他没有时间，因为我在西班牙工作，回国也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去年回国时再和牛犇老师联系，这次竟然成了，真让我喜出望外。

牛犇老师告知我他目前住养老院，我以为他已决定在养老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不料牛老师哈哈一笑，我进养老院的时辰还远着呢，养老院是暂时性小住，因为家里正在大修，上影集团就安排我在养老院暂住数月。

我找到养老院并敲响了他的房门，没有回音。没出两分钟就听见走道尽头传来了洪亮的声音，“这次比赛我们组发挥出色，一定能得优胜奖！”我一听就知道是牛犇老师的声音，只见他老人家手里端着两个盘子，盘子里装满色彩鲜艳、造型奇特的甜点。原来那天养老院举办甜点制作比赛，他是主要操盘手，比赛已进入决赛。牛犇老师说完，马上招呼我进屋，并让我品尝他制作的南瓜布丁。

我们边吃边聊，进入了电影的主题，“我10岁开始演戏，直至今日80多岁还在演。”牛犇老师说起他的从艺经历滔滔不绝，声音也变得高亢洪亮。

“我出生于天津生长在北京，年幼时父母双亡，靠哥哥接济。我很喜欢表演，常常和小伙伴们在街头模仿名人的肢体动作和说话腔调。一天我正在全神贯注地‘演角色’，被路过的老导演沈浮撞见，沈浮便停下观看。我看见有人注意我，不但没有怯场，反而更加自信满满地模仿他人的腔调。表演完毕，我和小伙伴们正准备散伙回家，沈导突然叫住我，问我姓啥叫啥几岁。我还以为要我去做临时工呢，哪知沈导一开口就问我，你愿不愿意去拍电影？我还以为这人逗我玩呢，直到他自我介绍是电影导演沈浮后，我才如梦初醒。就这样，我在沈导的发掘和引导下走进了片场，开始了演员的艺术生涯。在老一辈导演和演员的帮助下，我在表演上积累了很多经验，尤其擅长出演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，戏路也得到很大拓展。沈导还带我去香港拍戏，在港期间，被香港导演朱石林重用，一连拍了好几部有影响的电影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我和许多在香港拍戏的演员一起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打那以后我的片约更多，几乎是一部接一部。”

“您有没有找替身拍过戏？”我问。“从不，我不找替身。”牛犇老师回答得斩钉截铁。“我学的表演基础课程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，这个理论的基础和精华就是体验，一切从体验开始，演工人就去工厂学工，演农民就下乡务农，不但是外表要贴近角色，更主要的是演出角色的精神世界或者说角色的灵魂。因此我也有个‘演啥像啥’的外号。由于坚持不用替身，我也常常‘闯祸’，好几次拍戏时发生事故。记得有次在陕西的外景地，我的最后一个镜头是骑着马飞驰而去。就在开拍前出了状况，原先已经和我很友好的灰马这天突然生病，骑兵连的战士骑上一匹枣红马替代。由于没有时间磨合，开拍时，枣红马后腿一蹬屁股一撇把我从马背上摔下。我痛得眼冒金星，医生说肋骨骨裂，要休息10到15天。导演和制片急得团团转，剧组干等15天代价很大，而且完全打乱了摄制进程。我和医生说，你帮我注射局部麻醉剂，在胸口部位做一下固定，这场戏拍完我就在这里接受治疗。医生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同时他也到摄制现场做出紧急情况预案。骑兵连来通知，那匹灰马已经恢复健康。

在摄制现场，导演手提高音喇叭一声令下，我骑着灰马像离弦之箭冲了出去。表演完毕，导演看着监视器说，‘过！’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鼓起了热烈

和牛犇老师聊电影

王方（西班牙）

的掌声。片子洗出后，导演仔细看了我骑马这场戏说，这一条拍得非常完美，导演一拍桌子摆出一句：‘牛犇 Very Good.’”

牛犇老师说到此，拍拍自己的胸口，“现在一切完好无损。”他接着说：“20世纪50年代后，我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，那个年代是上影厂出产佳片的时代，我的片约不断，《龙须沟》《海魂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天山传奇》《牧马人》等影片一部接一部地参加拍摄。”

我说：“最令人难忘的角色就是在谢晋导演的《牧马人》中出演郭编子一角，您把精湛的演技融化在郭编子这个人物身上，无论是观众还是专家都为您塑造这个幽默风趣、有血有肉的牧民形象拍手叫绝。”

牛犇老师接着说：“和谢晋导演一起工作很荣幸，可以学到他对电影美学、对人物诠释的许多精辟理论和独到的见解。”

与牛犇老师促膝长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，牛犇老师招待我一起共进晚餐。晚餐在一家叫“上海外婆”的饭店内享用。我们的小车在店门口停下，牛犇老师一出车门就被店经理发现，经理拉住牛犇老师的手问长问短。看来牛犇老师是这家店的老主顾。我们之前并没有电话预约，但店经理似乎猜到今天牛犇老师要造访这里，已经特意让牛犇老师留出一间包房。经理道：“牛犇老师是名人，若在大堂用餐一定会被其他食客要求签名、合影，影响老师用餐。”

服务员拿出菜单让我们点菜时，牛犇老师还没有开口，服务员就说道：“牛犇老师的红烧肉和红烧芋头我已经写了，其他还要什么？”原来牛犇老师每逢在这里吃饭必吃这二道菜。

餐毕，我们再送牛犇老师回养老院休息，牛犇老师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，接着一个快速转身大踏步进入电梯。从牛犇老师走路的轻盈身姿和矫健程度、讲话时的底气力度、吃红烧芋头的胃口、谈从影经历滔滔不绝的精神状态来判断，牛犇老师日后再拍他几部电影没有问题。



说玉兔

宁骚

寅虎远行。卯兔耐心地等待了11年，随着第十二年的肇始，又一次来到我们中间。我要礼赞很少受人关注的兔子精神。

我礼赞兔子能动能静、动静有度、动静平衡的品性。所谓“静若处子，动如脱兔”，说的是兔子动起来如开弓之箭。所谓“兔兔赛跑”，只不过是勉励人们能够像乌龟一样坚持不懈。其实，兔子在一阵狂跑之后，静下来恢复和补充能量，观察和思考继续前行的路，可以更好地抵达目的地。与乌龟那样的不知休息、不讲效率地永动不已相比，我更喜欢兔子的能动能静、有张有弛。

我礼赞兔子在寂寞中坚守的韧性。月宫中的玉兔是圣洁的，也是寂寞的。传说中嫦娥奔月大概发生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末嫦娥时期。自那时以来的漫漫岁月里，月宫中的玉兔一直陪伴在嫦娥身旁。我想它的职责有二：一是长年累月地捣药，没有丝毫懈怠；一是当寂寞嫦娥舒广袖、翩翩起舞的时候，玉兔起身伴舞。玉兔的工作是平凡的，甚至是单调乏味的，在他的生活里罕见高光时

刻。也许在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时，玉兔能够有幸与人间诗仙共饮一杯酒；也许人间在满月清辉的沐浴中欢度中秋的时候，玉兔可以与人共享欢乐。然而，玉兔几乎总是身处清冷的环境里孤独地辛勤劳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它有足够的韧性，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耐得住寂寞，经得住时间的磨砺。

在由玉兔值守的这个生肖年里，我要大声赞扬玉兔的这些精神。这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扬称道的精神，相信今天会在千万人的生活和工作继续得到弘扬。

